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10月號將迎來出版三十五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一如以往慣例出版紀念專號，邀得多位編委惠賜鴻文，議論古今，敬希讀者垂注。

——編者

## 冷戰史、中美關係與越南問題

忻樸的〈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演化進程中的越南因素(1971-1980)〉(《二十一世紀》2025年6月號)一文在三個層面為學術界進一步理解相關議題提供了新知。

首先，就冷戰史研究而言，忻文出色結合了史學研究傳統與國際史研究特徵，超越了既有對「緩和」、中美關係、越南戰爭等特定議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視野。在明晰1970年代初中、美、蘇三方關係變化與全球冷戰轉型等基本史實後，忻文以越南問題為切入點，勾連起美國對外戰略、中國對外戰略以及中美關係等多重議題，使相關議題在冷戰國際史視野下獲得新的綜合理解。忻文同時指出，越南問題作為關鍵線索，體現了中國從「革命外交」向現實主義外交的戰略轉軌、

美國從擺脫「東亞錯位」到重構國際格局的戰略轉型，共同反映了以激烈意識形態衝突與對抗為主要色彩的「亞洲冷戰」在事實上趨於結束。

其次，就中美關係史研究而言，忻文突出了對安全因素及現實主義轉型的考察，以越南問題為切入點，詳細梳理了中美關係由「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向「初步戰略關係」轉變過程中的戰略機理與複雜歷史細節。這一分析補充了既往有關1970年代中美關係史研究敘事中「解凍」與「蜜月」、「特殊關係」與「準戰略同盟」等較為粗線條的描繪與判斷，嚴格定義中美兩國關係首先立足於以安全關切為首要要素的現實主義基底，並在此基礎之上結合發展與現代化等其他層次的戰略考量。忻文尤其表明，冷戰晚期中美關係的發展帶有歷史性、階段性的特徵，是以「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為表現形式的非同盟與安全議題協作關係，美國對華戰略定位提升是美蘇「緩和」戰略不斷受挫以至最終衰落的結果，而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則作為關鍵環節催動了前述邏輯的進展。

再次，就中國對外戰略史研究而言，忻文從大戰略的角

度出發，敏銳地指出了建國後中國對外戰略演進中兩次重要對外戰爭之間的邏輯同構性及其背後所體現出的冷戰觀、安全觀、戰略觀。「對越自衛反擊戰」是鄧小平敏銳意識到全球冷戰格局處在深刻轉型期後及時抓住機遇，從而推動中美關係升溫、借助外部力量促進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環節。這使得聯美外交在承擔「求安全」的現實主義職能之外，進一步增添了中國謀求全面融入世界體系和營造有利外部環境的「求發展」願望。

最後，忻文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構成經典冷戰基本特徵的「意識形態」概念。多年來，對於美國對外戰略與國家安全政策的分析，使得冷戰長期被學術界視作人心之爭與意識形態對抗的結果，以現代化道路差異為視角解釋冷戰如何爆發以及擴展至全球。忻文則指出，中國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革命外交」事實上源於對自身安全的追求，當國際戰略格局出現新的契機，中國同樣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量，果斷弱化乃至放棄「革命外交」，並投身至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中，再謀求發展與現代化。這一論斷無疑提供了異於冷戰史解釋意識形態範式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思路。

曹國濤 南京  
2025.6.20

## 尋找「同路人」

「三個世界」理論是中國當代外交史研究領域當中傳統

而熱門的話題，它從本質上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世界的深層次認知、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定位，中國決策者制定對外政策時依託的認知框架，決策的原則、流程以及複雜的動力來源。因此，「三個世界」理論蘊含着豐富的外交議題和深刻的學術內涵。蔣華杰的〈從「三個世界」到「南南合作」：中國第三世界政策的轉型〉（《二十一世紀》2025年6月號）是目前研究「三個世界」理論問題的作品中為數不多的優秀作品，文章有意識地依託立體多維的視角，剖析了「三個世界」理論所包含的中國外交的諸多經典話題與方法論啟示。

國家是國際關係或外交活動中常用的單元，但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和被高度擬人化的概念，國家實質上是由人組成的群體。正因如此，國家的對外交活動也一定帶有鮮明的社會性，而尋找朋友或夥伴，就是這種社會性的重要體現。文章從政策演變的歷史脈絡梳理了「三個世界」理論的演變過程，實際上展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外交哲學課題，即尋找可靠的同路人。所謂的「同路人」，簡單講就是在身份定位和敵我認知上持有相同或相近觀念的那些國家。

文章展示的政策流變證明，在中國外交的每一個歷史階段，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都不是達成戰略目標的主力軍，甚至有時與目標毫無交集，但卻能夠持續佔據相當重要的份量，並產生相應的外交

理論或思想。而與中國產生重要利益往來的大國，如蘇聯、美國、日本等，都無法與中國保持持久、穩定的關係。這體現了中國的外交哲學：與發達國家在國際規則、身份認同等理念維度的巨大差異，由此導致的陣痛式摩擦，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未來和身份定位懷有強烈的期許。

國家的外交哲學體現的是決策精英個人或者群體沉澱形成的世界觀，本質上體現了個人或群體的認知。中國決策者對發展中國家持久的青睞，相當程度上源自他們對發展中國家這個群體的模糊認知。亞非拉等地的發展中國家本就是政治、經濟、文化差異巨大的諸多地域和族群，但「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卻缺乏足夠的有關外部世界尤其是遙遠的非洲和拉美的必要知識，並且自身始終在文化和語言上存在着障礙，使他們難以充分理解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最終以「中間地帶」、「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等集體名詞聊作概括。

這既是由中國外交所要處理的對象廣闊而多元的本身特性決定的，也與中國領導人長於戰略思辨的習慣息息相關。不過，基於此種認知框架建立的外交理論或思想，一定會在細節或技術層次遇到挑戰。改革開放之初，外交外事系統和決策層對「三個世界」理論的反思，即代表了這種挑戰。例如，「以蘇劃線」會壓制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靈活性，以及政治上反華的國家或者反霸力量虛弱的國家也被劃入第三世界。這種認知框架或習慣，其

實是任何國家與群體進行外交交往時都難以避開的困境，因此，任何國家的地域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反覆試探或調整的過程。

外交活動關乎國運，更是極為複雜高深的智力活動，經常被學界歸納為理性活動的典型。但近些年的外交史或外交案例研究正不斷展示出理性決策模式解釋力的局限。「三個世界」理論誕生於大國博弈的重要階段，更是出自兩代領導人的親筆擘劃，因此無論從政策的價值、傳承，還是出於個人感情，這項外交理論都將具有很強的延續性。

這一經典案例也改變了以往外界對中國外交決策當中自上而下模式的刻板印象。文章揭示出，最初對「三個世界」理論的反思動力和群體恰恰是外交外事等職能部門的人員，他們分別從主權國家交往、政黨交往、對外經貿的視角，提出了各自的困境。此後，部分中央領導人也加入了政策討論，由此對主要決策者形成了全方位和立體式的信息反饋，最終完成了政策的調整。

外交決策的研究經常因為高度的保密性而被學界視作置於「黑匣子」中的學科，學科研究高度依託歷史學的方法，成果建設周期長，可驗證性受限。近年來，愈來愈多的中青年學者另闢蹊徑，通過更加多元的史料來源、更加謹慎的理論假設，以及更加細膩的邏輯推導，更好地探討中國外交決策的諸多特性和規律，極大地改善了中國外交研究。

樊超 北京  
2025.6.26